

刘少奇在 60 年代初 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贡献

薛 萍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概述了 50 年代末“大跃进”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危害,论述了刘少奇同志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纠正“大跃进”以来人们的错误认识,并在 60 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作者认为,刘少奇同志对当时困难的估计是正确的,对其原因和责任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他勇于正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并大胆调整的精神是我党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关键词 刘少奇 60 年代 “大跃进” 国民经济调整

1958 年到 1960 年“大跃进”中“左”的失误,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60 年代初开始的经济调整,党中央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正视错误,大胆调整,使国民经济较快地恢复过来。这是我党自己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又一次成功范例。刘少奇作为当时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经常主持者和国家主席,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重温他实事求是、正视错误、大胆调整的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摆脱经济工作中每隔几年便会或轻或重地重现一次的“左”的危害,做好当前的经济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 and 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由于超越了客观的可能,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使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到了 1960 年,我国的经济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主要表现在:

(一)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1960 年,粮食实产 2870 亿斤,比 1957 年的 3901 亿斤减少 26% 以上;棉花实产 2126 万担,比 1957 年的 3280 万担

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1]。

“大跃进”中,由于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使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1年增加了一倍。为了维持城镇商品粮的供应,不得不采取高征购的办法。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尽管征购了“过头粮”,仍然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不得不挖库存。1960年末粮食库存量降到573亿斤,比1955年的804亿斤减少29%。农业大幅度减产,粮食库存减少,这就形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城镇人口不得不普遍减少定量,农村人口不得不以瓜菜弥补口粮的不足。至于食油、肉类、禽、蛋等副食品的供应,比粮食更为紧张。

(二)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由于钢铁“元帅升帐”,要求产量翻番,有关部门必须相应配合,全面开绿灯让路。在钢铁生产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只有大上基本建设,这就造成了基本建设投资的配置很不合理,表现在:1、生产性投资比重过大,挤了非生产性的建设,特别是挤了住宅建设,加剧了学校、医院、商业及其他集体福利设施和群众住房紧张的局面。2、在工业建设投资中,用于重工业的比重过大,挤了轻工业。由于轻工业建设缓慢,特别是农业提供的原料减少,致使主要产品的产量减少。1960年,棉纱、棉布、卷烟、糖等的产量均低于1958年,造成市场商品严重匮乏。

(三)财政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大跃进”的3年中,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每年增加百亿元以上,造成了收不抵支,致使连续3年出现赤字:1958年为21.8亿元,1959年为65.8亿元,1960年高达81.8亿元。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不得不增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1960年末,货币流通量达到95.9亿元,比1957年的52.8亿元增长82%;每元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却由1952年的5.2元减至4.1元^[2]。群众手持货币增多,而市场商品短缺,有钱买不到东西。当时,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合理分配商品,不得不采取凭证供应的措施,除肉、蛋、糖、肥皂等按户凭证供应外,还制发了工业券,凭券购买日用工业品。

“大跃进”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其结果却是打乱了国民经济的秩序,导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基本建设规模膨胀,财政拮据,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对经济形势仍在“看涨”,并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广泛地“反右倾”(其实这时已无“右”可反),导致民主生活被破坏,正确意见被压制,使真实情况反映不上来。而且,形成一种很不正常的政治风气:诸如不容许党员和群众提出不同意见,否则很容易被扣上“思想右倾”甚至“反党”的帽子;不容许批评工作中缺点、错误,特别是各级领导人的缺点、错误,否则就可能被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党内斗争过火,对敢于实事求是、说真话的同志不适当地打击处分。

怎样认识并下决心纠正这些错误,成为摆在我党特别是我党高级领导人面前的严峻问题。这是对一个人党性考验,也是其能否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考验。

二

刘少奇同志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披肝沥胆、实事求是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错误和错

误原因，对当时统一党内认识，从思想上指导调整工作的健康进行，起了很大作用。

首先是对当时经济形势估计。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刘少奇同志认识到了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1961年他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以沉重的语气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3]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

怎样认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困难？到了1962年，在中央领导人中仍是有分歧的。在七千人大会上有的同志很乐观，认为形势已经根本好转，“58年的劲头又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有的中央局在讨论刘少奇同志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以下简称《书面报告》）时，发言者纷纷表示：“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份了”。认为《书面报告》关于1963—1972年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设想，任务提得太低了。有的同志对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刘少奇同志驳回了这些头脑发热的看法。他在报告中指出：“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报告列举了经济形势严峻的事实：1961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0%多；不少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而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市场供应紧张，人民吃穿用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膨胀严重；不得不进口520多万吨粮食，这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对困难的估计比《书面报告》更充分，他说：1959、1960、1961年这3年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还相当大；工业1961年减产40%还要多一点，1962年也难予上升；由于工农业减产，人民吃的粮食、副食品、肉、油都不够，穿的用的也不够。他尖锐地指出：“这种形势，对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4]

其次是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对于当时的严重困难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上从领导工作中找原因。1961年5月，刘少奇同志通过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认为困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所谓“人祸”，就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笏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5]

刘少奇同志一再重申，困难形势的出现，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是由于我们工作中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他不同意总是把成绩说成九个指头，把缺点错误说成一个指头。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

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6]

在当时“左”的思想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在多数同志对1958年“大跃进”严重失误还没有根本认识的情况下,刘少奇同志敢于根据群众和一些省、市负责干部的反映,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估计,指出在分析错误和成绩时,不能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硬套,是难能可贵的。没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不可能提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意见来。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是实事求是。全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地方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情况,不可能一样;在不同的时期,由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同,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情况也不可能一样。如果不具体分析,用一个比喻、一个公式到处套用,也就没有实事求是可言,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可言了。形势好,不可能绝对的好,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形势不好,发生了严重失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坏,也要看到取得的成绩。成绩有多大当然应该肯定多大,但更重要的是失误有多大也应该承认多大,以利于采取纠正措施。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才是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参与制定决策和指挥全局的各级主要领导同志来说,极为重要。回顾刘少奇同志的上述论述,我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启示。

三

从1960年冬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刘少奇作为这次调整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之一,始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纠正错误,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这个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刘少奇同志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分析形势。

经过连续3年的“大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被破坏。到1960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各方面反映了出来。党中央觉察到了国民经济中的问题,从1960年冬开始,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大跃进”中泛滥起来的“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得到纠正,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对形势的认识很不一致,调整工作并没有认真进行。在这一段时间,刘少奇同志是坚决主张调整的。他不仅积极参与了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制定,而且亲自深入基层摸情况、搞调查,对经济困难的形势及其原因作出了初步的正确的分析。

1960年7月至8月上旬,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分析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要调整,并确定了一些具体措施。8月10日,刘少奇同志在他主持的全体会议上总结了与会同志的正确意见,提出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业支援农业等措施。9月30日,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把农业放在首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这个方针。但是,由于受到“三面红旗完全正确”等框框的束缚和弄虚作假、分散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影响,八字方针没有得到坚决贯彻。

经济困难首先突出反映在农业方面。刘少奇同志尖锐地指出了农业问题上“左”的错误,反复

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他在1961年3月19日的讲话中说:“有多少商品粮,搞多少工业和文教事业。农业人口要吃饭,非农业人口也要吃饭,而且要吃得相当饱。这个规律,我们最近才摸到。这去中央、各省在这方面都犯了错误”。“1958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放卫星,许多东西弄虚作假,都登报了,震动了全世界。”刘少奇同志尖锐地指出:“我们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相当多的人民吃了苦头,现在要引起注意,取得经验。”

为了摸清农业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查出“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同志在3月广州会议结束后,就立即带领调查组到湖南农村进行调查。他在这次调查中,进一步摸清了情况,发现了农村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对一些当地急待解决的问题,如解散公共食堂、退赔社员的房屋家具、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以维护社会秩序等,他当时就指示县委就地予以解决。对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如对农村形势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等,刘少奇同志也形成了初步的看法,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准备。

第二阶段,从1960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同志为统一全党思想和部署全面调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1961年上半年的调查摸底,农业方面的情况已经清楚了,工业方面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调整工作开始进行。但由于许多同志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使1961年的调整工作进展比较缓慢。一直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全党的认识才比较一致,各方面的调整才全面展开。在这段时间,刘少奇同志针对党内一些干部的错误认识,正确地指出了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分析了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全党的思想统一和经济调整的全线铺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

1961年5月下旬,为进一步研究调整经济特别是农村工作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5月31日,刘少奇同志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分析了农业减产、工业后退的原因,提出了缩短工业战线、减少城市人口、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等克服经济困难的措施。这些为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后来实行的结果,证明对调整工业与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统一思想,认清形势,部署各方面的调整工作,1962年1月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是八大以后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讨论通过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这个长达5万多字的报告,是刘少奇同志主持起草和修改的,他为这个报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还向大会作了重要讲话,对书面报告的内容作了很重要的阐发和补充。刘少奇同志的这个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的历史性文件。特别是其中对于当时形势和工作中成绩、错误的估计,对于经济困难的原因和责任的分析,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党内正常生活的论述等,更是具有不可磨灭的深远意义。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应该承认,刘少奇同志在其中是起了主要作用的,是他把当时党的正确思想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文件中的。

第三阶段:从1962年2月西楼会议到5月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同志根据调整中出现的新情况,主持党中央作出新决策,保证调整的顺利进行。

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党对调整的迫切性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进行。在这段时间,刘少奇同志不断地注意发现和调整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并且根据情况的发展,对形势和困难作出了新的分析,采取了许多果断的措施。

根据七千人大会确定的方针,调整工作全面铺开,一些新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了。其中突出的是发现1960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将有50亿元的赤字。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决定专门开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于是2月21日至23日,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议分析了经济形势出现的新情况,进一步研究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他强调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还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政策。

对国民经济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整,好比是一场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没有正确的经济思想作指导是不可能取胜的。刘少奇同志对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意见十分赞赏。他亲自找人把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和文章汇编起来,向党内推荐。

为了确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7日至11日再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对经济形势作出了新的估计,确定了大幅度调整退够的政策及其相应的方针、措施,讨论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5月11日,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对困难的严重性和恢复的艰巨性估计不足的情况,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形势问题,要求全党都要以调整为中心做好工作。他指出:“为了克服困难,为了调整和改组我们的国民经济,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必须紧张地工作。”总之,还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当前是两项中心工作:一个是城市里调整经济、精简人;一个是农村中巩固生产队的问题。”^[7]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5月26日,根据会议精神发出了《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于是,全国上下迅速有力地贯彻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一系列方针决策,大规模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展开。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粮食总产量有较快的增长,1961年为2950亿斤,1962年为3200亿斤,1965年达到3890亿斤,差不多是建国后的最高年产量。全国的财政收支,1961年赤字10.9亿元,1962年转为结余8.3亿元,1965年结余7亿元。随着经济的调整,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职工年平均消费水平逐年增加,1962年为226元,1965年为237元,农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1962年为88元,1965年为100元^[8]。市场商品增加,社会购买力逐年增长,物价指数也有所下降。当然,列举的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能做到这一步,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中央的决策和措施正确,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卓有成效,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

四

60年代初,刘少奇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大胆进行调整,为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对刘少奇同志个人来说,却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并未从某些高级领导人头脑中彻底清除,而因此在他与毛主席的关系上蒙上一层阴影,埋下了刘少奇冤案的种子。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党和人民永远会记住刘少奇同志的历史功勋!

回顾这一段历史,正如薄一波同志指出的,我们应得到宝贵启示:一是犯了错误,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勇于正视,努力纠正,这是一个郑重的政党的标志。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史上的崭新

事业,我们没有经验,在干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关键是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密切审视全局,及时总结工作,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正,好的经验就坚持发扬,失误的教训就认真吸取。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干了蠢事,“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真正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做到。做到了,做得好,益处极大。二是创造良好的民主气氛,让大家充分讲话,真正实行“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地委、省委、直至中央),上级要虚心听取意见和批评,不能文过饰非。三是各级领导同志对错误要勇于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也都分别作了自我批评。以至张治中先生听了刘少奇同志关于这次会议的介绍情况后,对中央领导同志自觉检讨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他还说:这可以充分证明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9]。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30年多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的指导思想已经得到纠正。但是,刘少奇同志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正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并大胆调整的精神和态度,仍是我党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身体力行。这不仅因为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不能说过去发生过“左”的错误,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发生;而且还因为,这种“左”的错误的影晌在今天的实际工作中并未彻底根除。所以,重温这段历史仍然可以受到教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2][8][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884、886、1076、1045页。

[3][4][5][6][7]《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8、419、337、421、447—448页。

(本文作者系我校政法系中共党史研究生,指导教师为朱文显教授)